

蓝锡麟 选注

晏子春秋选

巴蜀书社

晏子春秋选

蓝
锡
麟

选
注



(川) 新登字 008 号

责任编辑：魏宗泽

封面设计：游天云

封面题字：郭预衡

晏子春秋选

蓝锡麟 选注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方福利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175 千

1994 年 6 月第一版

199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90 册

ISBN7—80523—583—x/I·227

定价：7.75 元

前 言

(一)

在先秦古籍中，《晏子春秋》是一部既有一定影响，又有一些争议的专著。

有影响，在于它作为一部专著，多侧面多辐向地记载了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的言行，有助于后人了解其人其事，进而研究当时社会的历史动向。人物的集中性和代表性，情节的具体性和生动性，以及语言运用的简洁明朗，又使它成了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唤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和审美的愉悦。从两汉以来，不少信史和类书将它列入典籍，记录在册；称引者和研究者也代不乏人，而且播扬到海外学界。晏婴的人品随着晏婴的故事风传流布，更是几近家喻户晓。

有争议，在于它作为一部古籍，到底成书何时，作者何人，迄今尚无定论。它的思想倾向，或者叫做学派归属，长期以来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这些还引出了作品真伪问题，同样地聚讼纷纭，有待厘正。

有影响而又有争议，导致了一个特异的现象。一方面，传诵晏婴其人其事，知道《晏子春秋》其书的人广及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当今一些古文选本也不惮选入其篇章，甚至连儿

童都会摆谈《晏子使楚》之类的故事。另一方面，则像对待有争议的人一样，我们的思想发展史和文学发展史都把它搁置一边，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关注得太不够。缺乏专门的选本，或许就是这一现象的产物。

要改变这一现象，当然需要切实的考证。截至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这部专著产生于战国后期，作者是至少属于“士”这个阶层的世居齐国或者旅居齐国的人。出于对晏婴思想的追慕和对战国时势的厌恶，作者辑录了齐国史料的载记和民间传说的故事，寄托了个人（或与之同类型的人）的愿望和追求，剪裁编排成帙，使之流传开来。这不但有《史记》、《汉书》等可以为证，而且，1972年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中的33枚《晏子春秋》残简文字与今本大致相合，尤为有力的佐证。即便两汉之后传抄当中不能排除错落、窜入、臆改之类的事情发生，基本状况也是难以否定的。

如果成书年代大体确定了，那么，纵使作者依然待考，《晏子春秋》一书也应在先秦思想史、文学史上占居一席之地。特别是从文学嬗递关系看，说它与《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一起，上承先秦历史散文和其他子书，下启汉代的史传文学，未必会过誉。

通过选本，让人们对这部专著有个轮廓比较清晰的了解，多少有益于启迪思想和陶冶性情，乃尝试作《晏子春秋选》。

（二）

《晏子春秋》里的晏婴，与实际生活中的晏婴比较，既是

同一个人，又不是纯粹的同一个人。生活原型确实是基础，但从书中所记言行看，分明寄寓着作者的理想，打上了作者情感的烙印。这样的晏婴显得更完善，更令人景仰，因而也就更深入人心。读其书，想其人，适于把他当作一个生活真实与艺术再造相统一的人。

历史上的晏婴，字平仲，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500年。他出身世家；青年从政，公元前556年（齐灵公二十六年）其父晏弱去世后，继任齐卿，历仕灵、庄、景三朝，长达五十四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史记·管晏列传》说：“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对他的政行人品，司马迁赞叹不已，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后人常拿晏婴同管仲（？——前645年）相比，合称“管晏”，认为晏婴的德行在上，功业不及。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忽略了各自所处的、不随个人意志转移的历史条件。管仲的确有杰出的政治才干，但他之所以能够辅佐齐桓公（？——前643年）成就霸业，首先是由于当时的齐国正处在鼎盛时期，经济、军事实力雄厚，其次也因为齐桓公励精图治，善于用人，支持他厉行改革。晏婴的境遇，则与之大不一样：

晏婴历仕的三朝，国君都属于荒淫平庸之辈。而齐国的国势，已经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败境地。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清醒地看到：国内赋役繁重，刑戮苛酷，

“踊贵屦贱”，民怨沸腾；国君沉溺酒色，侈靡放佚，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权臣以力干政，恃强凌弱，弑君换主，将欲代之；尤其是田氏大斗贷出，小斗收回，减轻剥削，甚得民心，民众认为“公室骄暴，田氏慈惠”，“归之如流水”。他深知“此季世也”，浩叹“齐其为田氏乎”，意识到自己业已没有回天之力。便他站在维护齐国公室利益的立场上，痛心疾首之余，又殚精竭虑地尽力补天，这无疑是晏婴的悲剧所在。不过，排除这种历史进步性与保守性的矛盾，单从微观看，司马迁给他以“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评价，是颇中肯綮的。《晏子春秋》的作者，正是如此看待和再现晏婴的生平言行，多是其是而忌非其非。今人品书论人，不妨也将晏婴视为特定的“这一个”，不必过分按索历史。

(三)

现今流传的《晏子春秋》，分内篇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篇重而异者、不合经术者八卷，凡 215 章。如卷目所示，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当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涉身的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卷则较为驳杂，与内篇六卷相通而又相别。具体展现的思想内容，卷与卷之间、章与章之间确有相对独立性，但也有勾连，有交合，个别的还有所抵牾。选本注意了去粗取精，意蕴情致相对地比较一致，可以贯通。晏婴的政治态度、

思想观点、施政措施和道德风貌，都渗透在所选的各篇中。

反映得最集中、最突出的，是晏婴对国君的劝谏和诱导。必须像这样，自有相应的历史原因。在专制制度下，除了那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谋家，任何能干的政治家要想有所作为，都不能不依赖最高统治者，而无论其人为何品类。晏婴要补天，自然也得疏通他所侍奉的齐国国君，说通一点算一点，做到一步算一步。他的补天之方大致上有五条。一是尚礼。他强调：“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选文中的《不可无礼》、《礼不可去》、《二桃杀三士》等篇，都是要用礼维系现存秩序。二是重民。他的所谓“民”，固然主要指士和国人，但也不排除驯顺的奴隶。得民才能保住公室统治，所以他主张“先民而后身”（《先民后身》），并且提出了“民诛”的警告（《封人三祝》）。三是薄敛。这是从经济上“为民请命”，希望能减轻赋税，减少劳役，从而有利于阻止民归于田氏（《善为人臣》、《谏阻修长床》等）。四是省刑，即要求齐君不要随心所欲地滥杀无辜。《谏诛圉人》、《一言省刑》等篇，都是从政治角度立言，对籍重狱多，“踊贵屦贱”的暴露相当惨烈而深刻。五是除谗去佞，赏善官能。《国有三不祥》、《审择左右》等篇，就从不同角度反复申明了一同论题，至今犹耐人思。所有这些，固然都以挽“季世”、护公室为依归，但倘能实行，多少总会对下层人民带来一些实在的好处。唯其如此，流誉百代的晏婴其人，首先是一个仁人、惠人形象。

其次，尽管晏婴从事内外应对时露滑稽多智的性格特征，

但他迥异于淳于髡、东方朔等俳优或弄臣。这一点，体现在他的“进思尽忠”上，乃是毫不拘泥于愚忠观念。当齐景公问他“忠臣之事君也何若”的时候，他敢于当面答以“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忠臣事君》）；而且后来以行动证明，言行相一致（《崔氏之祸》）。体现在他的直面危难上，又是胆识兼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守志抗盟》）。体现在他的劝谏、诱导上，更是善于分析矛盾，掌握火候，采取灵活的方式，达到针砭的目的。其中，有直陈（《求贤之道》），有婉谏（《不知天寒》），有反激（《不可无礼》），有热讽（《牛山独笑》），有冷嘲（《谗佞难除》），有喻引（《水与石》），有理导（《国有三不祥》），甚或还有戏弄（《智斂婴子》）……简直左右逢源，无施不为。至于外交领域中波谲云诡，也无不谈笑从容，应付裕如，随处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辱国格、人格（《不肖者使楚》、《南橘北枳》）。内内外外，林林总总，充分显示了政治上的坚定性、思想上的明晰性和策略上的机敏性。汇聚到一点，突现出晏婴决非只是一个谋臣或辩士，而更其是一个能人和智者。

再其次，晏婴的“退思补过”，又表现为待人宽以约，责己重以周。他自奉节俭的美德是广为人知的。齐景公多次要给他调整住宅，还趁他出使在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坚决辞谢了。单从《一言省刑》一篇，即可略见一斑。还有《千虑一得》、《酒罚田无宇》等篇，或从饮食，或从穿著、车驾，相当全面地勾勒了他的俭朴精神。而《不背老妻》，又从婚姻关系上写出了他的严肃和执著。如此廉洁奉公、淡泊明

志，且不说位极人臣，就是在一般封建士大夫当中，也是难能可贵的。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当梁丘据自叹不如的时候，他还诚恳地加以开导，说明“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道理，指出赶上自己并不难（《为者常成》）。有了他那样的地位和声望，还这样谦虚谨慎，在旧时代可谓罕见，在新时代也未必就很多。所以应该说，他还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与以上三个方面相应，晏婴的政绩和美德不仅泽及当世，而且衣被后人，也有众多具体的反映。除了《谏诛圉人》、《救犯槐者》、《救斩竹者》、《烛邹主鸟》几个故事外，《结识越石父》、《御者夫妇》表现出他怎样慧眼识才，披肝重才，破格选才，都是相当典型的。当他遭到猜疑、被迫出亡的时候，北郭骚宁肯自刎而死，也要替他洗雪，说明他在当时人望之高，影响之大（《以身相报》）。连弑君篡权的崔杼也不得不惊呼：“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氏之祸》）直到他去世多年以后，弦章还效法他“辞赏以正君”，透露出他的风采依然让后人怀想。

可以说，《晏子春秋》是为晏婴立传的。书中篇什分开看，如零珠碎玉；合拢来，就成了完璧联袂。借用当代文艺的一个术语，把这部书称为系列作品也无妨。

（四）

如果将《晏子春秋》放到先秦散文的整体框架中略加比较，不难发现，这部专著记人言行，的确受到《左传》、《国

语》和《孟子》、《荀子》等典籍的熏染，尤其与《韩非子》、《吕氏春秋》的叙事篇章颇相近。但像它这样专记一人，并且把中心人物的言行进退与特定社会的治乱兴衰融为一体，自始至终以人统事，以行驭言，又是独树一帜的。对于《史记》、《汉书》以人系事的史传体式，说它开了先河一点不为过。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实传记之祖也”；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加以辩证，认为此书“与著书立说者迥别，列之儒家于宗旨固非，列入墨家于体裁亦未允，改隶传记庶得其真”。

但《晏子春秋》又与史传有别，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说，“书中皆述晏遗事，实魏征谏录、李绁论事集之流”。其记叙遗事，以写实为主，间入虚构，决定了它在文体归向上更像一部叙事性的系列文学作品。论文学特征，它在四个方面确实有一定成就。

第一，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情节具体、生动。作者善于撷取历史素材的某些片段，大而至内政外交，出外应对，小而至饮食起居，衣著车马，纵向或者横向地展开矛盾，表现冲突，显示前因后果。有些内容还比较复杂，也能够写得纵横交错，波澜迭出，开阖有致。如《二桃杀三士》，由三个勇士强横无礼写起，经由晏婴出谋划策，馈桃成功，把情节推向了高潮。纵向开掘中，截出关键环节的横面极力渲染，有声有色、绘形绘神地铺写了三个勇士的争功、取桃、让桃、自杀，使人感到既在意料中，又在意料外。最后以士礼收葬，淡然作结，似乎轻易消歇下来了，却又令人感

慨。这样一个故事，引起了后人多少评议和发挥！又如《牛山独笑》、《智斂婴儿》、《夜移三家》、《以身相报》和使楚故事，也无不纠葛突出，变化得宜，让人百读不厌。

第二，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有立体感。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晏婴，来于历史，又出于历史，成了一个文学典型。他那既是仁人、惠人，又是能人、智者，而且品德高尚的个性特征，都融进具体、生动的情节，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立体地反映出来。如《崔氏之祸》和《守志抗盟》两篇，就让晏婴置身于崔、庆之乱的血雨腥风，表现出了他的敢怒敢骂，大智大勇，刚正不阿，始终如一。而在《千虑一得》、《不背老妻》中，又通过他个人对封赏、对妻室的恬淡自重、清白如水的态度，与横眉冷对崔、庆之时犹若两人。这是相互矛盾么？显然不是。相反地，一个血肉丰满、气韵逼真的晏婴，正由此而跃然纸上。又如另一个贯穿全书的陪衬人物齐景公，以及谗佞典型梁丘据，在《牛山独笑》、《一日三责》、《不知天寒》、《礼葬走狗》等篇中也勾画得有鼻有眼。甚至偶尔一现的御者夫妇（《御者夫妇》）、北郭骚（《以身相报》）等人，也是可触可摸的活人。

第三，叙事状人，成功运用白描手法。通览全书，除了《佯问佯对》、《极大极细》等个别篇什略具《庄子》汪洋恣肆、机妙横生之风而外，其他多是朴实、简洁的线条勾勒，最多也不过淡墨点染。但是，叙事条畅平易，状人重在传神，不仅不平板、枯涩，反而别有一番自然、明快的情趣，读之如食橄榄，愈品愈有兴味。如《景公为履》，写了齐景公如何用

金玉装饰鞋子，“冰月服之以听朝”之后，接着写道：“晏子朝，公迎之，履重，仅能举足，问曰：‘天寒乎？’”寥寥17个字，前面6个字交代了人和事，中间6个字写出了齐景公举足维艰之态，后面5个字则在一问之中托出了这个荒唐国君欲掩窘态、无话找话的复杂心理和神情，胜过了描尽画绝的千百个字。《景公奔丧》写他时而乘车疾驰，时而下车小跑，反复四次的细节，也与之异曲同工。他如《四肢无心》、《魂魄之亡》、《折冲尊俎》、《劝导柏常骞》也是好例，更不用说《御者夫妇》、《不肖者使楚》等名篇了。

第四，语言简练洁净，明白晓畅。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多姿多色的人物性格，都乘驾着这样的语言轻车，轻松和顺利地走进读者心灵。即便是议论文字，也编织在流动的对话当中，托理于情，化繁为简。其间，还运用自如地调动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段。颇为突出的是善用比喻，如把祸国奸佞比作社鼠猛狗（《社鼠猛狗》），把君臣关系比作心与四肢（《四肢无心》），把己身不正而欲禁人的行为比作“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禁自内始》），无不新颖贴切而又涵蕴深刻。同一个“水”，比喻人心归向叫“归之如流水”（《民归田氏》），解喻廉政长久的道理则叫“其行水也”（《水与石》），显示出了擅长抓住喻体的特点。还有些比喻，例如形容临淄繁盛的“张袂成阴，挥汗成雨”（《不肖者使楚》），更与夸饰兼用，平添了形象性和感染力。至于对比（《两治东阿》）、反复（《任非其人》）、讽刺（《牛山独笑》）等修辞手法，也用得各尽其妙。语言的精妙，无疑增强了这

部书的艺术魅力。书里一些隽言妙语（不止如上所举）流传至今，成为生命力旺盛的成语典故，还丰富了我们的民族共同语。

当然，书中一部分篇什只能划归一般的记言性散文。这种状况，乃为先秦散文绝大多数所共有，不能因之而否定全书所具有的文学性。何况《晏子春秋》专记一人，确乎孕育着一些小说的基本因素。

（五）

这个选本着眼于思想性、文学性尽可能统一，以照录为主，节选为辅，共辑了105篇，约为原书的二分之一。每篇选文都包含提示、原文、注释、译文四个部分。

提示部分，首先交代选自原书何篇何章。然后，尽量简明扼要地浅析思想内容与写作特点，有的篇章还作了一点或横或纵的比较。浅析力求抓住主要的环节，点出特色之所在，不以完备为务。这样做，意在约略起到引子的作用，而又决不妨碍读者自己的欣赏品鉴和探幽发微。

原文部分，基本上根据近人吴则虞先生的《晏子春秋集释》，间或参用了其他版本。断句标点也是这样。但少数地方，个人理解有异于前修时贤，只好根据语义文法，作出自以为比较恰当的处理。是不是妥贴，有待于方家审详。

注释部分，主要是酌取学界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间以个人的千虑一得，尽力做到翔实和简明。举凡难懂的或者可

能会有歧义的词语、典故，以及有关的人物、史实，大都不避琐细地列出了条目。每一条注释，总是先注词，若有必要再释句，只有个别的地方稍加笺证。每篇选文注释的多寡繁简，悉以该篇语句的深浅难易而定，简不避寡，繁不惮多。前面作过注释的，后面一般不再注，但若有必要，也不避免重复。

译文部分，以直译为主，也揉进了意译的成分。严复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说的是译外文，也适用于译古文。所以选本的译文主要是在准确上下功夫，其次是求完整，求顺畅，进而才奢望行文的优美。想是这样想，真做起来却也不容易，常为译妥一句，踌躇移时。即便如此，舛误与不畅，仍计所难免！有心的读者何妨自己译一译，当会苦在其间，乐亦随之。

原文中有一些引语，如引《诗》引谚，只在注释内加以诠释和试作今译，在译文中则原封不动。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联想到今人引经用典都是照引不误，古人引用，也该同样办理。还有些称谓、名物之类，窃谓同样也不宜对译（如“寡人”，现代汉语就没有另外一个相应的词），译文中都只好照搬。这样做，究竟合宜不合宜，还请读者斟酌。

原文每章都有标题（或为后人所加），概括文意。但太长，因而选本另外拟了题。如第一篇选文，原题为《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现在借文中晏婴的一句话，改成了《不可无礼》。也有别人另外标题的，如《晏子使楚》，这个选本为突出要害，改作《不肖者使楚》。若引用，自然以原

本为据。

按以上体例，一本《晏子春秋选》终算是联缀出来了。然而，甘苦之忧才下眉头，疏失之惧又上心头。一厢情愿地希图作点有益的事，客观效果是不是会有背愚衷呢？实在未敢逆料。好在人世间，谁都逃脱不了实践法官的审判，即便惶惶恐恐，也将它奉献出来吧。

蓝锡麟

1985年3月29日初拟

1991年9月23日再改

目 录

不可无礼	(1)
景公废酒	(5)
乐亡礼从	(7)
赏罚失中	(10)
抱病强谏	(13)
倾国之道	(18)
善于解惑	(20)
封人三祝	(24)
牛山独笑	(27)
一日三责	(30)
不恤死伤	(35)
不知天寒	(38)
四肢无心	(40)
野人骇鸟	(44)
谏诛困人	(46)
藉重狄多	(49)